# 语文辞书校对浅谈

■刘 宇

语文辞书是指收列普通词语，从音、形、义、用法等语言学角度进行解释，并举例说明词义和用法的词典。语文辞书具有权威、准确、全面、系统的特点，是指导人们正确使用语言文字的规范，供语言文字工作者和学生等日常查考的工具，其编校质量至关重要，这就对辞书校对提出了更高要求。

**研读体例，夯实根基**

体例是编写辞书的基本规定和格式，以保证规格整齐、层次分明，涵盖收录范围、立目规则、条目分级、释文项目、编排方式等。辞书要有严谨的体例格式来支撑。体例犹如辞书的“骨骼”，要搭得细密结实。语文辞书的体例尤其繁杂，是校对的重点和难点。打造精品辞书，必须在体例上下功夫。以《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为例，辞书体例的校对重点如下。

*辨别字体字号*。不同功能的文字应用不同的字体字号严格区分，不得混用。如：释义用宋体，例句用仿宋，拼音用等线体，西文用新罗马体，儿化音的“儿”用小字号，等。辞书中释文和例证常交替出现，增补内容尤其要注意字体字号是否正确。

*熟悉符号系统*。符号是辞书体例的重要组成部分，可简明直观地提示语义、语体、用法等。

*严查排序层级*。辞书所收字词按一定规则排序，不同辞书有不同的排序规则。《现代汉语词典》中词条排序的大原则是音序优先，即先按第二个字的汉语拼音音序排列，《古代汉语词典》则是音节优先，即先按词条字数由少到多排列。校对时要对排序错误明察秋毫，发现问题局部调整，校次完成后做整体核查，尤其注意核查多音字拼音。

*规范版式设计*。为方便检索，语文辞书一般会设置天眉。汉语辞书一般是当页字头或首尾拼音上天眉，外文辞书一般是双码上当页首词条，单码上当页尾词条。梯标位于切口，自上而下错落排列。按版式样排版后，每一校次均应核查梯标内容和位置正确与否。

**打磨释文，精雕细琢**

释文是辞书的灵魂，应力求精准、严谨、全面，揭示词语的本质含义。除了词典编纂专家和语言学家，百科类词条还应经相关专家多轮审读，涉政类词条还须送上级部门审核。可见释义的推敲是一项学术性很强的工作，马虎不得。掌握释文的出错规律，调动编辑思维，校对也能有针对性地发现问题。

*关联词条释文要呼应*。校对辞书时要做到“瞻前顾后”，将语义相关词条联系起来做释义对比分析，可发现不严谨释义的蛛丝马迹。

*释文表述要严谨规范*。释文要有统一的规范用语、语言风格、说明顺序，同类词条还要呈现模板化规律。

*释文内部顺序统一*。如：“导医”释义为“引导或指导患者合理就医”，“导学”释义为“指导或引导学习”。释义内部顺序不一致，有失严谨，建议统一表述为“引导或指导……”

*说明性文字表述统一*。如：词语辨析中指代易混词时，“二者”“两者”应统一；说明语体色彩时，书面语“色彩浓”“色彩重”应统一；“唐宋时”“唐宋时期”“唐、宋时”等表述应统一；等等。

*同类词条释义模板化*。如以地名词条为例，可总结出释义呈“专名类别。地点。又名。”的规律。读到“虎丘：山名。在江苏苏州市……，又名海涌山。”便能敏锐捕捉到细微差别，将“又名”前的逗号改句号，统一释义格式。

*释义范围力求精准*。给词条下概念性定义或做语用说明时，可能出现语义范畴过大或过小的情况。校对开动脑筋，深入思考，也可发现释义中的漏洞。但切忌妄改，要改必有据。

**推敲例证，精益求精**

例证是对释义的重要补充，帮助读者理解词语的含义和用法。虽经作者和编辑的甄选，也难免存在疏漏，需要校对擦亮慧眼，敏锐察觉出隐性问题，优化例证，精益求精。例证校对原则可列举如下。

*例证要导向正确*。校对例证的首要任务是从意识形态上严把导向关，确保传递正面积极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不符合国家大政方针、与主流意识形态相违背的，应建议修改或替换。

*例证要与时俱进*。注意识别与时代脱节、不符合客观事实的例句，这点在校对修订版辞书时要特别注意。如例证中出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可建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例证与释义要匹配*。包括两层含义，一是位置上要对应，避免出现佐证义项2的例句误放在义项1后的情况；二是意义上相呼应，如“壮年”释义为“三四十岁的年纪”，例证“他五十出头，壮年早逝”“五十”超出释义“三四十”的范围，例句不妥。

*例证中要正确使用替代符*。常见错误有：被释词语未用浪线“~”代替；未使用正确数量的浪线代替。

**落实专项，臻于完善**

专项检查是辞书校对的重要环节。辞书体量大，校对工作一般由多人分工协作完成，能做到局部核查。辞书通体校对完成后，还应安排天眉、排序、拼音、检字表、互见词条等的专项检查，再次整体把关，确保辞书内部体系功能完备。

*排序*。每一校次完成后均应安排大字头和词条的排序检查，发现问题及时调整。排序检查要做在前面，避免后期大幅版面调整。

*互见词条*。辞书定版后，要对“也说”“也作”等互见词条和页码进行专项核查，确保文字一致、页码不落空。

*检字表*。检字表核查也要在辞书定版后进行，做到页码准确、字形统一，确保检索路径畅通无误。

*蓝图*。重点辞书会安排蓝图的专项校对，确保蓝图与付印清样完全一致，重点关注生僻字或造字字形是否出现偏差、字体粗细是否有异常。

语文辞书校对的专业性很强，校对员须经严格培训才能胜任。校对要有导向意识，协助编辑守好意识形态阵地；校对要有问题意识，熟悉语文辞书常见差错，敏锐提出有效质疑，弥补编辑疏漏；校对要有辞书思维，用系统、动态、联系的眼光看待辞书的有机整体，于微观处精雕细琢，于宏观处整体把控，做好编辑工作的延续；校对要有工匠精神，为追求品质不惜反复打磨，精益求精，筑牢辞书编校质量的坚固防线。

（作者单位：商务印书馆）

# 年鉴索引编制方法——以《中国水利年鉴》为例

■柯尊斌

年鉴索引是年鉴编撰最后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年鉴全书内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年鉴的“工具书”功能所赋予的内涵并作出的规定，也列入全国年鉴评奖范畴，设置了相应的得分指标。“缺少索引，扣3分；索引质量差，也要适当扣分。”可见，中国年鉴界对年鉴索引越来越重视，没有编制索引的年鉴是不规范的。有学者说：“缺乏索引的年鉴是不完整的年鉴”“缺乏好索引的年鉴不可能是优秀的年鉴”。

《中国水利年鉴》创刊于1990年，1997年卷《中国水利年鉴》第一次编制索引。虽然当年纯手工制作卡片很麻烦，但凭着老一代年鉴人的执着，一直坚持并传承下来每一卷都编制索引的习惯。后来，按照“主题索引”的原则，先提炼主题词（关键词），再借助电脑查询，半手工制作，比原先效率提高了很多。从这样编制索引的工作历程可见，《中国水利年鉴》编纂质量不断提高的道路也是很艰辛的。

编制年鉴索引有多种方法，从笔者经验看，编制好的年鉴索引没有捷径可走，必须老老实实埋头苦干，再加上一些经验技巧。有的单位专门设计年鉴索引编制软件，但效果不理想，所编索引质量很一般，没有推广使用价值。近年，《中国水利年鉴》的索引编制采用如下流程步骤。

各责任编辑根据分工和要求，分头在定稿上按专栏、栏目、分目和条目先后顺序提取主题词。提取索引词要处理以下两个问题：一是提取一级索引词和二级索引词，在一些信息量较大的一级索引词下，列出一批二级索引词；二级索引词条头空一格加以区分，如果是全彩或双色印刷，用色彩区分二级索引效果更好。二是对于一批相关主题的内容或数据，要概括出隐性主题词，这是一大难点，需要编辑人员拥有一定的水利行业知识储备，熟悉行业术语规范。

主题词提取后，对照排版书稿标注出处页码和分区符号。这项工作要注意：一部分一部分做，以提高效率；集中做容易忘记主题词的位置，浪费时间。提取主题词是编制年鉴索引最关键、最重要、最麻烦的环节，也是技术含量最高的环节。年鉴索引质量高不高，关键看提取的主题词准不准、简不简、深不深、广不广、层次多不多。当然，这与年鉴的编纂质量密切相关。

责任编辑在进行检查核对提取的主题词、出处页码和分区符号工作时，往往会出现主题词少字或多字，出处页码、分区符号漏标等情况，发现问题，应及时纠正，并请排版人员统一排列格式及字号、行间距等，以方便下一步操作。

*合并主题词，再次检查*。排版人员把各责任编辑核对好的主题词按书稿前后顺序归并到一个Word文件中，然后对整个文件进行检查，交叉校对，确保准确无误，删除错标、泛标、空标，删除不够资格的主题词，处理重标。

*排序*。年鉴索引通常采用音序，第一个字的拼音字母按升序排列，同音字按四声声调先后排列。

*划分标引区域*。按标引词首字拼音第一个字母区分不同的区域，数字排在最先，按0~9先后顺序排列；字首拼音字母按26个英文字母先后顺序排列，各字母作为索引栏目的分目。

*归并同类主题词*。以上只是一个初步的排序文件，其中会出现不少问题，如同类主题词重复、同字头标引词不相连、多音主题词首字位置不对等。此时就要归并重复主题词，标出参见出处页，出处页要按先后顺序排列。查找首字为多音字的标引，这是索引编制的一个难点，很容易被忽视。

*处理或插入二级标引*。把二级标引插入到相应的一级标引词之后，二级标引词缩进一格，有的缩进两格，上下对齐，并标出其附见出处页码。在处理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二级标引词漏删、二级标引词未缩进等问题。因此，编排、校对时需要格外仔细。

*分栏*。《中国水利年鉴》索引分两栏排，分栏之后要进行敲行处理，标引词过长转行要缩进一格。有的转行标引词未作缩进处理，容易产生歧义，不规范；有的第一行排满再转行，排版不美观，也不规范。参见出处页码和附见出处页码与标引词一般空一个字符，页码与页码之间用逗号隔开；也有的放在行末，右对齐，与词条之间靠连续点号连接。

*全面校对*。分栏排版时，根据页面还要作一些删减处理，以消除留白。但在删减标引词过程中很容易会删错，出现新的问题，务必仔细。进入全面校对阶段时，一般采取多人交叉校对的方式，由于标引款过多，字又小，难免有疏漏。为了尽可能减少疏漏，有一个“笨”办法比较可行，就是分工把各个音标的标引词首字按顺序摘录下来，就能发现错标位置、漏标页码、二级标引当作一级标引、首字相同标引分散排列等问题。

（作者系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副编审）

精品精荐

# 三维共生·中华民族是历史性形成的多元有机整体

## ——兼谈中国历史民族地理研究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 中华民族 多元一体 三维共生

○刘 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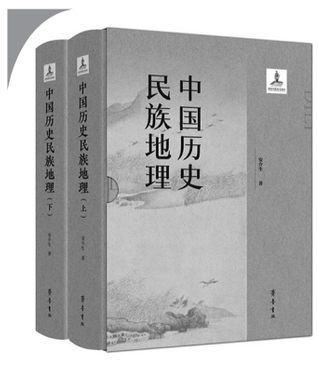
中华民族是历史性形成的多元一体的有机整体，其形成和演变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中国多民族分布的历史依据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从远古时期开始，中国地域辽阔，部落与民族分布广泛。而每一个当代民族都是由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古老部族演变发展而来的，这些部落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演变过程中，通过不断交流、融合与分化，逐渐形成了今天中国特有的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相互交错居住”格局。总结起来，可以说，中华民族的形成是一个兼具时间延续性、空间拓展性与逻辑自洽性的有机整体过程，三者相互交织、互为支撑，共同构筑了中华文明的深层结构。

**时间性：文明延续与历史积淀的有机统一**

中华民族的形成以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为基石，历经数千年积淀，呈现出“层累凝聚”的时间逻辑。

*文明起源的多元一体性*。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长江流域的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以及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等，共同构成“多元一体”的文明曙光。尽管各区域文明各具特色（如良渚的玉礼器、红山的龙图腾），但都蕴含“祖先崇拜”“天人合一”等共同基因。考古发现表明，距今5000年前后，中原地区通过吸收周边文化精华（如山东龙山文化的黑陶技术、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逐渐成为文明汇聚的核心，开启“月明星稀”的早期一体化进程。

*王朝更迭中的文明连续性*。从夏商周三代到明清，中国的政治中心虽屡经变迁，但文化基因始终一脉相承。制度层面：商周确立的宗法制度、秦汉推行的郡县制、隋唐完善的科举制，形成“大一统”政治传统；文化层面：甲骨文—金文—小篆—楷书的文字演变链，《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的文学脉络，儒家思想从先秦子学到官方意识形态的演进，均体现连续性；技术层面：四大发明的迭代传承（如造纸术从西汉麻纸到东汉蔡伦改进）、农业技术的代际积累（如《齐民要术》到《农政全书》的农学体系），构建起实用技术的延续性体系。




《中国历史民族地理》
安介生著/齐鲁书社2024年1月版/490.00元
ISBN：9787533347963

*近现代转型中的文明再生*。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在危机中完成从“王朝国家”到“民族国家”的现代转型。梁启超提出“中华民族”概念，将历史上的“华夏—四夷”叙事升华为“多元一体”的现代民族认同；新文化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推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融合，形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型文明形态。这种“传统—现代”的时间链条，证明中华民族并非静态实体，而是在历史长河中不断重构的有机整体。

中国的民族识别工作也为多民族分布格局的形成提供了重要依据。从新中国成立开始，中国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民族识别工作。通过科学的方法和充分的民族意愿尊重，中国最终确定了56个民族。这些民族各具特色，拥有不同的历史、文化、语言和习俗，共同构成了中国丰富多彩的多民族大家庭。

**空间性：地理格局与文明辐射的动态平衡**

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从黄河流域逐步扩展为“多元一体”的地理—文化共同体，呈现“中心辐射—边缘融入—全域整合”的空间逻辑。

*中原核心区的形成与扩散*。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今河南、陕西一带）因气候温和、土壤肥沃，成为早期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商周时期，以洛阳为中心的“天下之中”观念形成，通过分封制将中原文化（如礼乐制度、青铜文明）向四方辐射：分封齐国（今山东）、燕国（今北京）等诸侯国，将中原农耕文明与“东夷”“北狄”等族群的游牧文化融合；秦统一后，通过修驰道、筑长城、开灵渠，将岭南（今广东、广西）、“西南夷”（今云南、贵州）纳入版图，推行“书同文、车同轨”，实现空间整合。

*边疆与内地的互动融合*。中华民族的空间拓展并非单向征服，而是核心区与边疆的双向互动。北方草原：匈奴、鲜卑、蒙古等族群与中央王朝既有冲突（如汉匈战争），更有融合（如北魏孝文帝改革推行汉化）；元朝将蒙古草原与中原农耕区统一于“大元”版图，奠定现代中国疆域基础；西域与青藏：汉代张骞通西域开辟丝绸之路，唐代设立安西都护府，清代驻藏大臣制度，推动汉、藏、维吾尔等民族在宗教、贸易、艺术等领域深度交流；东南沿海：闽南文化、岭南文化在宋元海上丝绸之路中吸收阿拉伯、东南亚文化元素，形成“海洋型中华文明”分支，如泉州伊斯兰教圣墓与妈祖庙并存，体现多元共生。

*地理屏障与文明韧性*。青藏高原、戈壁沙漠、太平洋等地理屏障，既赋予中华文明相对独立的发展空间，又通过陆上/海上丝绸之路保持与世界的联系。陆上丝绸之路使中原获得汗血宝马、葡萄等物种，输出丝绸、瓷器、造纸术；海上丝绸之路推动郑和下西洋，将中华文明传播至印度洋沿岸，同时引入青花瓷钴料技术、阿拉伯数字等外来文明成果。这种“半开放半隔离”的地理格局，使中华民族在保持文化主体性的同时，具备吸纳异质文明的弹性空间。历史上的民族迁徙也是形成多民族分布格局的重要因素。这些迁徙活动不仅改变了各民族的地理分布，还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逻辑性：文化认同与制度整合的辩证统一**

中华民族的有机整体性，本质上是文化共识与政治整合共同作用的逻辑结果，体现为“文化认同—制度建构—民族自觉”的螺旋上升。

*文化认同：超越血缘的文明共同体*。中华民族的核心认同要素（如汉字、儒家思想、春节等）具有超族群、超地域的特性。汉字认同：从甲骨文到简体字，汉字成为联结汉、满、蒙、回、藏等民族的文化纽带；儒家价值观：“仁”“和”“礼”“天下观”等思想不仅为汉族政权所接受，也被少数民族王朝奉为治国理念；民俗融合：春节贴春联、端午赛龙舟等习俗，在历史上由汉民族扩散至各民族，同时吸收少数民族元素（如蒙古族那达慕大会、傣族泼水节纳入中华文化体系）。

*制度整合：从分封到共和的治理创新*。中华民族通过制度创新实现不同族群、地域的整合。郡县制与行省制：秦代郡县制打破贵族分封，元代行省制奠定现代行政区划基础，二者均以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的平衡，维系多民族国家统一；羁縻政策与民族区域自治：唐代羁縻府州、清代盟旗制度，与新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一脉相承地体现“因俗而治”的治理智慧；科举制的超族群性：从隋唐至明清，科举制为各民族精英提供上升通道。辽代契丹族、清代满族均有进士及第者，如曹雪芹（满族）家族通过科举融入中华文化核心圈层。

*民族自觉：从自在到自为的认同升级*。古代中国以“天下观”构建文明共同体，近代以来，在列强冲击下，中华民族从“自在民族”走向“自为民族”。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呐喊，将地域、族群差异消弭于救亡图存的共同目标，实现“多元一体”认同之质的飞跃；新中国成立后，通过民族识别、推广普通话、建立统一多民族国家叙事体系，进一步强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体意识。

这种逻辑演进表明，中华民族的整体性并非自然天成，而是文化认同与制度建构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华民族的形成是时间连续性（文明基因的代际传递）、空间拓展性（地理疆域的动态整合）、逻辑自洽性（文化与制度的协同进化）共同作用的产物。三者缺一不可：时间性赋予其历史厚度，使“中华文明成为唯一未曾中断的古文明”；空间性赋予其地理广度，使“多元一体”成为疆域与族群的真实图景；逻辑性赋予其内在凝聚力，使文化认同与国家制度形成良性互动。这种三维共生关系，不仅解释了中华民族“为什么能”历经5000年风雨而不散，更昭示着其在现代文明进程中持续演进的生命力。

今天，我们考察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三维共生，研究中国历史民族地理，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首先，中国历史民族地理的研究融合了历史学、民族学、地理学等多个学科的研究方法和视角，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跨学科的研究平台，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和把握中国各民族的历史发展脉络*。通过研究各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起源、迁徙、融合和分布格局，我们可以更清晰地认识到各民族是如何在历史长河中相互影响、相互依存，共同铸就了现今中国各民族分布的基本格局。这对于我们认识和理解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考察和探究中国历史民族地理有助于促进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通过对各民族历史地理问题的深入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各民族的历史渊源和文化传统，增进各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这对于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最后，中国历史民族地理研究还具有现实指导意义*。通过对各民族历史地理问题的深入研究，我们可以为当前和未来的民族政策、边疆治理和区域发展提供重要的历史借鉴和参考。这对于推动中国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具有重要意义。